

# 我国古代丛书的派别及分类

陈 毓 瑾

我国古代丛书浩如烟海,门类繁多,自古以来,对丛书的派别与分类众说不一。本文从丛书编纂者的编辑旨意出发,以丛书的编纂特点为界限,将丛书分为四大派、两大类,并分别阐述了各派的编纂特色,各类的主要内容。

关于古代丛书的派别与分类,历来众说纷纭,标准与界限不统一。谢国桢先生的权威性著作《明清笔记谈丛·丛书刊刻源流考》将古代丛书分成四大派六大类,即:目录派、版本派、校讎派、综合派;汇刻类、类刻类、辨伪辑佚类、自荐类、郡邑类、族姓类。这基本上概括了古代丛书的派别与分类,但由于标准不统一,致使界限有些不清,例如:版本派和校讎派是从丛书的编纂特色来分的,有的丛书以所收书全是珍本善本见长;有的丛书以它校讎精审见长;而综合派经、史、子、集,融汇百家,包罗万象,是从所收书的内容上来分的。在综合派丛书中,既有版本校讎优良的书,也有辑佚丛书。谢国桢先生关于类和派的区分也有些混淆,例如,汇刻类是在内容上指经、史、子、集皆有的丛书,这就与综合派重复。六大类中,汇刻与类刻是从内容上来划分,而辑佚、自著、郡邑、族姓四类只能说是从收书范围上来划分,因为很多辑佚丛书或是郡邑、族姓丛书从内容上看都是包括古今著述,内容庞杂的汇刻丛书,只不过是仅一地、一姓的著作而已,所以,谢国桢先生说“兹综其内容约可分为六类”<sup>①</sup>是有失偏颇的。

后来,有人将清代丛书分为综合派、辑佚派、版本派、校讎派,与谢国桢先生的分法大致相同,只是多了一个辑佚派,少了一个目录派。其划分标准不一,欠妥之处与谢国桢先生同。还有如高文超同志在《清代丛书的编辑特色》一文中<sup>②</sup>,根据内容特点,将清代丛书分为四种类型,即综合类、目录派、版本派、校讎派。实际上,目录派、版本派、校讎派从内容上看都属综合类。这种分类似乎也不太合乎逻辑。

丛书派别的划分,应从编纂家编纂丛书的目的出发,归纳出丛书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以此为界限来划分。真正的丛书派别,其形成是在清初以后。乾隆年间,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已经稳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转入低潮,农业、手工业空前繁荣,与此相应,学术研究也方兴未艾,出现了一大批有个性的编纂家。这些编纂家同时也是学者,有的是搜罗广博、嗜书如命的藏书家;有的是长于考据的校勘学家;有的是能辨别真伪、版本源流的版本学家;有的是以保存史料为宗旨的目录学家。他们在编纂丛书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融进了自己的治学特点,因此形成了各种丛书的派别、种类及其特点。

窥其编辑之旨及其特色,古代丛书可分为版本派、校讎派、目录派、辑佚派四大派别。

一、版本派丛书 这一派专以仿刻善本为尚,以版刻争奇。每书皆据祖本原封不动地仿刻,不失累黍,庐山面目,历历俱在。其用意在于使后人能见到古本真面目。这一派的编辑者多数是藏书丰富,且多秘笈。

珍本的藏书家，如黄丕烈。他是乾隆间举人，一生酷爱藏书，搜购宋版书就有 100 多种，自号“佞宋主人”，修建了专室藏书。他编辑的《士礼居丛书》，目录列书 20 种，附 3 种，实刊 19 种，均以采本为底本，参以家藏和其它藏书家的版本，经过仔细校勘后印行于世。他还在每本书后附上识语，记述版本源流，校刻缘起，底本和校本情况。其中《战国策》、《周礼》郑氏注皆宋本嘉槧，用原书影刻，公之于世，几可乱真。此外，李调元的《函海》、卢见曾的《雅雨堂丛书》等，都是选用珍本、善本为底本的优秀版本派丛书。

二、校雠派丛书 这一派以考订详实，校勘精审著称。这一派的编纂家们认为，古籍版本的好坏与校勘有着密切的关系。宋元刻本也不一定尽善尽美，在反复的抄写过程中，必有错漏遗误，而且宋人每好逞臆而改旧本，因此必须对它们进行严密的校勘，然后方可印行。乾嘉时期，校勘学发展十分迅速。每个校勘学家均有自己的校勘指导思想，归纳起来，可以分成两大流派。

第一大流派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这一流派的指导思想是：“谨守家法，笃信汉儒，多泥于古；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其是非。”<sup>③</sup>也就是说，这一派定汉学为一尊，拘泥于古本的一字一句，校书用死校的方法，用古本校今本，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也从原本。这种方法，只能校异同，不能校是非。它的优点是：不参编纂者或校勘者本人的意见，能保持祖本原来的真实面貌，因而能使各种版本流传下来，为以后学者的研究提供多方面的参考。

另一大流派是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他们的指导思想是：“以辞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版归一。”<sup>④</sup>也就是说，他们采用的是活校，不拘泥于古，讲究实事求是，对任何人的观点不轻易相信，发现错误以后，一定要旁证博引，确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才加以改动。这种科学的校勘方法使校勘学达到鼎盛。这一流派的代表主要是戴震、卢文、段玉裁、孙诒让等人。卢文是乾隆间进士，官至侍读，归田以后以读书为乐，每天天不大亮就起床校书，直到黄昏，夜晚又在灯下继续校读，20 年如一日，所校之书，不下三四十种。“每校一书，必搜罗诸本，反覆钩稽，手批目验，必取至当”<sup>⑤</sup>，方肯罢休。钱大昕在《抱经堂丛书·序》中这样写道：“抱经先生精研经训，博极群书，自通籍以至归田，铅槧未尝一日去手，家藏图籍，皆手自校雠，精审无误。凡所校定，必参稽善本，证以它书；即友人后进之片言，亦择善而从之，洵有合于颜黄门所称者，自刘贡父、楼大防诸公皆莫能及也。”此外，顾广圻也是乾嘉时期受人推崇的校书家。顾广圻认为：古书流传年代久远，抄刻过程中，错误在所难免，如果确实有依据，定当改正无疑，但必须审慎，有疑问的地方，宁可空缺，留着等后人或者掌握了这一点的人去改正。倘若马上凭自己的臆断去修改，而又没有古籍作依据，就会弄得似是而非。他主张“书以不校校之”。“不校”是指明知有误，且不改动原版文字；“校之”是指将校正意见写出考证、校记附刻于书后。他这样即尊重古人，更尊重后学者，把自己的意见仅作参考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所以他在校书时，不仅必于每书之首罗列他所据各种刻本，以供后人查考，并且在每书之后附上考证、校勘记。这样，既不强改古人著作，泯灭原书面貌，又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给后人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无疑对学术的发展是一个大的推动。段玉裁也是当时著名的校勘学家。他主张校勘古书，首先要辨明所据版本的是非，然后才可判定立说是非。这种注重版本真伪的校勘方法，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方法上都是对校勘学的一大发展。

无论是卢文、顾广圻，还是段玉裁，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认为从事校勘，必定要有较扎实的学问功底，一定要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人才能胜任。经过他们校定而编纂成的丛书，一般都是考订详实，辑纂精审的秘笈珍本，而且大多数都有编者写的序跋，详细介绍此套丛书所收各书的版本源流，得书始末的还于校记之外，写出笺补，对所收各书作出评介。

这一派别的丛书之魁，当推卢文的《抱经堂丛书》。卢文在校勘这套丛书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发现了许多宋人的错误，比如校《经典释文》一书，他就发现了宋本之讹脱，反较经解本为甚。因此，《抱经堂丛书》是一部以求实著称、校勘精良的丛书典范。继《抱经堂丛书》之后，尚有毕沅的《经训堂丛书》、孙星衍的《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臧庸的《拜经堂丛书》等，都为一时之佳选。

三、目录派 这一派广采博收，旨在存目，其丛书可以说是古代图书综录。这一派的主要人物都是鼎鼎大名的藏书家，如鲍廷博、张海鹏、吴省兰等。鲍廷博一生，未做过任何官，一心一意筑室储书。朱文藻在

《知不足斋丛书·序》中,这样记叙他的藏书情况:“三十年来,近自嘉禾、吴兴,远而大江南北,客有以异书来售武林者,必先过君之门,或远不可致,则邮书求之。浙东、西藏书家,若赵氏小山堂、卢氏抱经堂、汪氏振绮堂、吴氏瓶花斋、孙氏寿松堂、郁氏东啸轩、吴氏拜经楼、郑氏二老阁、金氏桐华馆,参合有无,互为借抄,至先哲后人藏手泽,亦多假录,一编在手,废寝忘食。”所以当乾隆皇帝为编《四库全书》,搜罗天下秘籍佚书的时候,他能检取斋中藏书626种,送呈四库馆。丰富的藏书为他汇刻丛书创造了优越的物质条件,使他编纂的丛书内容广博,包罗万象。无论是经史考订,还是诗话说道;无论是风雅遗事,还是算书、美术、地理,凡是曾经出现过,裨益见闻者,一概收录。《知不足斋丛书》编纂时间达50年之久,共收书207种,分30集,781卷,其中很多是罕见的子史诸书,这为后人全面了解子部、史部著作,提供了素材。

此外,还有以刊刻古书为己任的张海鹏。他是江苏常熟人。常熟在我国古文献学上享有盛名,贡献极大,她从明代起,就是一个藏书基地。毛晋的汲古阁在这里,钱谦益的绛云楼、钱曾的述古堂在这里。瞿绍基修建的铁琴铜剑楼也在这里,张海鹏出自藏书世家。他的父亲张仁济有照旷阁,藏书达万卷。他的侄子张金吾有爱日精庐,藏书8万多卷。对于这些书,他每每这样叹息道:“古今载籍几经厄劫,历观史志所载,及藏异家所著录,存者百无一二。方今典籍大备,不有以聚而流传之,将日久散佚,此后生读者之责也。”<sup>⑥</sup>因此,他“矢愿以剞劂古书为己任”,“以惠后来之沾溉”<sup>⑦</sup>。他所编辑的《学津讨源》20集,收经史子集各类书170多种1410卷,全是宋元以来有关经史实学、朝章典故,足以广见闻,资以考证的珍本。每本书之后,都附有“四库提要”,没有提要的书,全有跋详细叙述此书来龙去脉。如果说《学津讨源》还不能达到存目的旨意,那么他编的《墨海金壶》便收书更广泛,更珍稀。关于这套丛书,著名学者石玉韞在《第六弦溪文钞·卷四》中说:“余披览其目,凡九经七纬,以及史氏遗闻轶事,旁逮兵、农、方技、禾阜、乘、一家之言,无所不罗列而灿陈之。此其搜罗之广,采访之勤,固非咫闻曲学之士所能及也。”《墨海金壶》主要收明以前的著作,清人著作较少,为了统摄荟纂清人珠玑般散见的著作,他又编了《借月山房汇钞》,或仅就筐衍所有,或购访于友人,或借抄于同仁,得书135种,13函102册,分16集。内容包括经学、小学、杂史、野乘、奏议、传记、地理、政书、史评、儒家、术数、艺术、谱录,以及杂家、小说、诗文评类、本末之学等等,范围广,选择精,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存目性质的大型丛书。

乾隆间吴省兰编辑的《艺海珠尘》也是一部目录派丛书。它不仅汇集前贤遗编,而且注意刊刻当时的一些还未付印行的优秀著作,使很多几于失传的书籍流传下来,为保留我国古籍作出了贡献。

四、辑佚派 这一派的特点是编辑家专事辑佚工作。他们搜罗群书,在这些书中发现已经散失的古籍的段章残句,把它们拼凑起来,复原古籍面貌。辑佚之业,导源于宋代王应麟之《玉海》,后有明代孙贲的《古逸书》。到清代,学者们力求把《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目录中有而后来失传的书籍次第辑出,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先后辑出《汉魏遗书钞》、《二酉堂丛书》、《十种古逸书》等。在编纂《四库全书》时,辑佚学家们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经部就有66种,史部有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共375种,4926卷。后来,这些书全部收在《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内。被复原的书条理精审而略例明晰,价值很高。还有人专辑已经失传的地理书,编纂成《麓山精舍丛书》,也有人专辑已经失传的目录,编纂成《快阁师石山房丛书》,这在辑佚丛中又独具一格。

丛书虽说分成这四派,但也不是绝对的,往往一部丛书兼有两派的特点,例如《知不足斋丛书》,它收书众多,具有目录派存目的特点,同时它又收了许多佚书,如苏轼之子苏过的《斜川集》,南宋时就为数不多,清康熙时下诏征求此书也没有征求到,直到乾隆时,历城周永年才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出,厘为六卷。嘉庆时,法式善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事二卷,刊于《知不足斋丛书》中。类似这样的情况,其它丛书也有,这是与一些编辑家既是藏书家、目录学家,又是辑佚家;既是版本学家,又是校勘学家或者目录学家分不开的。

如果从内容上将丛书分类,那么可以分成如下两大类:

一、汇刻类,即综合类 所谓综合是指所收书的内容相当广泛,经、史、子、集无所不包,诸子百家无所不存,任它是正统的儒学,还是非正统的杂学;是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经纶,还是研究天文、地理、农

工医兵的著述，都兼收并蓄，百家杂陈，充分表现出大而全的特点。然而，尽管大而全，却不杂不乱。所收每种书皆首尾完整，目录另编，卷次统排，为一部有系统、有章法的著作，毫无割裂、拼凑之嫌。其代表当推《四库全书》，其它还有张海鹏的《学津讨源》、《借月山房汇钞》、《墨海金壶》；钱熙祚的《守山阁丛书》、《小万卷楼丛书》等。时代稍早的《百川学海》就是一部罗宏富的综合性丛书。它收书100种，共177卷。所收书时代远的，有晋代及六朝人的著作；时代近的，近及唐宋人的作品。各种学说流派皆兼收并蓄。民国初年，陶湘在重刻《百川学海》的序文中说：“若求其采渊宏，体例完备，于学术得融贯之益，于原则无割裂之嫌，合四部为一编，如百川之归海，名实相副，巨细无遗，开从来汇刻之风，为后世丛书之祖者，惟左氏《百川学海》庶几足以当之。”嘉庆年间，由吴省兰辑刊，钱熙祚续成的《艺海珠尘》10集，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综合性丛书。它共收书205种，其中有经学、小学、舆地、笔记、小说、掌故、天文、历算、诗文等，虽不分四部，内容却十分丰富。清代后期综合性大丛书具代表性的有咸丰年间，由伍崇曜、谭莹编辑的《粤雅堂丛书》等。

二、类刻类亦称专刊类丛书 即一部丛书内专收某一专业、某一学科的著作。从丛书发展历史看，专刊类丛书出现最早，远在南齐，陆澄便编辑了《地理书》，梁朝任 编纂了《地记》。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目录一卷”，其下注曰：“陆澄合《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澄本之外，其旧书并多零失，现存别部自行者唯四十二家。”其后又记载：“《地记》二百五十二卷”，其下注曰：“梁任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以为此记，其所增旧书亦多零失，现存别部自行者唯十二家。”这两部之后，才有《儒学警语》《儒学警语》也可说是一部专刊类丛书，从内容上看，它仅收轶闻琐事、典章掌故一类；从时间来看，仅收当世文人的作品。

到后来，这类丛书专业性越来越强，专业面愈来愈窄，经、史、子、集四部分开，或专收经部书，例如阮元编纂的大型丛书《皇清经解》，专收清代考证家解经之书。纳兰性德刊刻的《通志堂经解》专收宋元人解经之书。稍后又把小学从经学中分离出来，专辑小学类的著作，例如任大椿收集古文字、音韵、俗字方面的著作编辑成《小学钩沉》，顾震福补收切韵诸书及《声类》《小学篇》《音谱》《字统》等书又编了《小学钩沉续编》。有的甚至将音韵、文字、训诂也分开，有专收音韵方面的，例《江氏音学十书》、《音韵学丛书》；文字方面的《字学三种》、《字学三书》；训诂方面的《许学丛刻》、《稷香馆丛书》等都蔚为巨观。

至于史部丛书的编辑，盛于明代，沈节甫编有《纪录汇编》收书123种，216卷。清代学者在编史书方面比较薄弱，但也作了不少补志、补表、考订辑佚工作，并在很多方面超过前人。例如，张之洞编订的《广雅书局丛书》，汇集史部书93种，1771卷，几乎将清人史部撰述全部网罗备至。

子部丛书具代表性的有明代周子义等辑的《子汇》共收书24种，33卷；归有光编辑的《诸子汇函》及《合诸名家批点诸子全书》。清代子部丛书主要有《二十二子全书》、《二十五子汇函》、《子书二十二种》等。子部丛书内又分许多小类，包括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数学、术数、艺术、杂家、小说、道家等，其中中医学丛书为我国国宝。据《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从宋元到民国，我国医学丛书共有130部。元代杜思敬的《济生撮萃方》就是较早较好的一部。它专收内科、儿科、针灸方面的书籍只19种。还有清代陈嘉 编辑的《医学粹精》、周学海编辑的《周氏医学丛书》等等，几乎将医学精华全部收录在内。中医学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是与这些文献资料的积累分不开的。

集部丛书汗牛充栋，几乎占丛书总数的五分之一。从较早的宋代刘辰翁编的《王孟诗评》9卷，宋代陈思编的《两宋名贤小集》，直到清代光绪十年（1884）张寿荣编辑的《戴段合刻》24卷，约有500多种，内容主要是诗、文、诗文评、词、曲，有很多都是将孤本搜集起来汇刻成的，如《孤本无明杂剧》《红室传奇》等。沈 已久的词、曲、古剧重见天日，不仅丰富了丛书内容，使丛书具备了各种体裁，而且也成为研究古典文学必读的著作。

如果按收书范围将丛书分类，则可以分成郡邑类、族姓类、独撰类三类。明朝天启年间，樊维城辑海盐历朝县人著述，编辑成第一部按作者籍贯编辑成的丛书——《盐邑志林》，共收海盐历代学者著述41种，65卷，尽管所收书不是原文足本，间有缺失，但为丛书的编辑方法又开辟一条新路。自此之后，清道光年间，岭

南吴兰修辑刊了《岭南丛书》;咸丰年间,伍元薇、伍崇曜辑刊了《岭南遗书》;光绪年间,王灏辑刊了《畿辅丛书》等等。从地区来看,由南至北,有光绪中盛宣怀编辑的《常州先哲遗书》;道光间邵廷烈编辑的《娄东杂著》。从区划范围来看,大到一个省,小到一个县,例《湖北丛书》《沔阳丛书》,几乎将当地所有文献包罗在内。这对于研究某一地区的文化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有一些编辑家专搜集一族一家的著作,然后编为一书,称为“族姓丛书”。姓氏之学由来已久,而编辑族姓丛书始于明代。如:晁 编的《晁氏三先生集》,刊于明嘉靖间,收晁迥、晁冲之、晁说之三人著作共8卷;清赵饮谷辑《高阳四种集》收许承家、许昌龄、许迎年、许德音四人著作共16卷,刊于清康熙年间。宛邻张氏惠言兄弟皆为以学术文章著称的名家,他们自编了《宛邻张氏丛书》;高邮王氏祖孙三代俱为学术造诣高超的大学者,王恩沛、王恩泰自编《高邮王氏家集》稍后,罗振玉又编辑了《高邮王氏遗书》。这类丛书聚一家之言,家学一脉相承,风格独异,是我国独特的丛书编纂方法,足以启迪后人传诸百祀。最后一种便是独撰丛书。开始的时候,学者们并不自己编集,都是后人将前贤著述搜集起来,编辑出版。如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范明泰纂辑的《米襄阳志林》,仅收米芾一人的五种著作;施邦曜编辑的《阳明先生集要》只收王守仁一人的四种著作。后来,有某些学者开始将自己的著作编为若干集成为一套丛书,称为自著丛书。例戴震的《戴氏遗书》;段玉裁的《经韵楼丛书》及近代王国维先生的《王静安先生遗书》。

丛书发展到清末民初这个时候,各个学科的学术著作,一个地区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一族一家的重要著作以及学者个人尽毕生之力呕心沥血的主要成果都包容在里面,使丛书成为我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大珍贵宝藏。

#### 注 释:

- ① 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丛书刊刻源流考》,第226页。
- ② 《编辑学刊》,1991年第4期。
- ③④ 赵仲邑:《校勘学史略》
- ⑤ 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丛书刊刻源流考》,第212页。
- ⑥⑦ (清)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朝议大夫张君行状》

(责任编辑 张琳江平)